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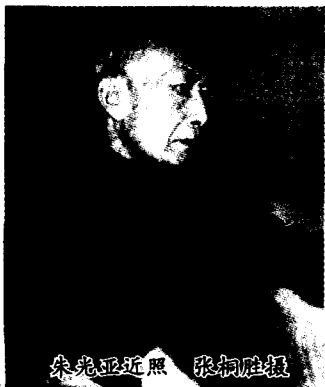
——记核物理学家朱光亚

□文/陈晓东

1. 他几乎是一个神秘似的人物

就像一部精彩的电视连续剧，他是编导之一又是领衔主演。就像众人参与创作的不朽画卷，他是监制人之一又是挥毫泼墨者。但是他一直保持沉默，好像这些惊世之作不属于他的。他不是那种张狂自己或追逐名利的人。他的成功恐怕就在于他懂得辩证的人生：大风唱起却小声。他就是朱光亚。

朱光亚这个人物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才渐渐地被中国多数人所了解的。他的名字常常出现在报刊和广播中。一般的老百姓猜测他肯定是个大人物，否则他为什么会成为中央委员呢？业内的人士敬佩他是因为他和钱学森工作在同一单位，他是一个大科学家，受人敬重是当之



朱光亚近照 张桐胜摄

无愧的。然而他究竟干了些什么工作，或许他那辈人以后的科学家也难以说清楚。

他给人很“冷”和威严的印象。即便在公众场合或从电视上看到他，他总是不苟言笑。他那酷似关云长的面孔和竖起的剑眉，让人产生敬畏感，又使人联想他是金戈铁马的骁将。加上他对自己的身世和所从事的事业守口如瓶，人们对他就愈发感到神秘莫测了。

有关介绍他的文字即使在九十年代也寥寥无几。很多作家、记者都想在他身上做点文章，他都一口拒绝了。过去他不张口那是他严守党的秘密。但随着中国“两弹一星”的揭秘，他也不愿意让人写他。据说有一作家写了一篇小文章在报纸上发表了，他看到了大为光火。1996年初，解放军出版社策划一套“国防科技科学家传记丛书”，其中有他的名字，报请他审批时，他把自己的名字划掉了，并批示说：“要写就写80岁以上的科学家，他们是该写的时候了”（大意）。其实他已年逾古稀，他一生都献给了祖国的神秘事业，为什么就不能说说自己呢？在国防科工委四十年和中国科学院建院五十周年的文献中，都有他撰写的回忆文章，但他都掌握了一条原则：只谈别人和集

体，不谈个人，以致谁想从他哪里挖点“干货”都很困难。这次笔者写他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有关方面的帮助下，才得成此文。

朱光亚曾是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一至十四届中央委员。他从事专业的职务就更多，从二机部原子能研究所负责人之一干起至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以后和钱学森一样，做了国防科委副主任等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他总在步钱学森的后尘，钱学森不当中国科协主席了，他接替了钱学森的职务。钱学森任几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朱光亚以后也出任了这一职务。有报道说：“在政协八届二次会议大会选举那天，出席会议的近两千全国政协委员将96%的选票投给了朱光亚，选举他为全国政协副主席。朱光亚作为新中国的原子弹、氢弹科技攻关的组织领导者之一，和其他许许多多参加这一庄严事业的科技专家一样，长时期在海内外很少抛头露面，以至于他被提名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候选人，政协委员们在审读他那简短而不平凡的履历时，都感到了深深的震动。”

值得一说的是：朱光亚1994年出任了中国工程院的首任院长和党组书记。这一职务标志他领衔中国最高的又一学术机构。

在此之前中国只有科学院一家。这样能成为院士的人在中国人眼里是了不起的人物，何况成为两院士的人就更不得了，他们都是“国宝”级的人物，享受着特殊的待遇和照顾。众多的资深的科学家们推选朱光亚为中国工程院第一任院长，可见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样，人们自然会对他的一切发生兴趣。

2. 灵秀的山水与机遇

朱光亚应该说是长江的儿子。他1924年12月15日生于宜昌，籍贯湖北汉阳。幼年时的他随父母从宜昌经沙市迁至汉口。曾在汉口第一小学和圣保罗中学学习。据知情者讲，他家并非什么“书香门弟”，也无什么显赫的家族背景，只是他与长江结缘，是母亲河给了他的灵秀与聪慧。大概又是三国的故事和人物熏陶了他（火烧连营的故事就发生在宜昌等），使他从小就有了驰骋疆场的豪气。抗战爆发后的第二年，朱光亚随两个哥哥被迫转移到四川，先后就读于合川崇敬中学、江北清华中学、重庆南开中学，1941年从重庆南开中学毕业。这一阶段是朱光亚人生打基础的重要阶段，因此他又有了川江人那种韧性和对待人生苦难的挑战性。他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川江上船夫们拉纤时发出的泣血号子声：“哎唷，哎唷……纤绳拉肩上呀，手扒石头脚蹬沙呀，寒冬腊月也不怕呀，爬呀！爬呀！……”这是人与自然决斗的精神，也是流淌在朱光亚血脉中一支昂扬的歌。此后朱光亚的人生不正像歌唱的一样在走吗？朱光亚后来回忆说：“正是沙坪坝南开中学一年半的学习时光里，受益于数学、物理和

化学老师的很好教育，不仅教我怎样做人，还唤起了我对自然科学的美好憧憬。特别是魏荣爵老师（现南京大学教授、中科院院士）讲授的物理学，使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41年夏高考统一招生，由于当时国民党政府鼓吹“工业救国”，朱光亚报的第一志愿是工科，而不是理科。就在他要与物理学失之交臂时，好像老天爷有意安排似的，他不幸染上疟疾，发高烧，未能坚持考完。不久，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为名额不满的专业举行第二次招生，大病初愈的他才得以按本来的志愿考入了物理系。不知是巧合还是朱光亚就是喜欢长江，他就读的大学仍然在长江的岸边。这期间，讲授大学一年级普通物理学的是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赵广增教授（抗战胜利后任北京大学教授物理系主任），赵老师为人师表的治学精神、渊博的学识和他所讲的课程内容以及他介绍的学科前沿的课外辅导等，都给朱光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更激起了朱光亚学好物理学科的决心。1942年的夏天，这是朱光亚一生中最光辉的转折点，也是他一生中最好的机遇。当时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在重庆招收插班生，他在南开的几位校友热情的说服和帮助下，毅然决定背着校方报名应试，顺利地转入西南联大学习。

西南联大可是一个人才济济的地方。她是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而成的联合大学，成立于国难当头的抗战时期。尽管当时学校的教学和住宿条件等都十分简陋，但联大却具有良好的学术空气和中国最顶尖级的教授。如周培源、赵忠尧、王竹溪、叶企孙、饶毓泰、吴有训、吴大猷等人。这些人在自己的学术领域内

都是颇具权威和影响的。现仅举一例，如赵忠尧老先生，他于1998年5月28日以96岁的高龄辞别人世。他的两名学生、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和杨振宁都从海外发来了唁电称赵老师学术成就“是与安德逊的实验同样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性”、“他所作的关于正负电子对之产生及湮灭的工作是世界一流的”。连安德逊也承认：“他理应获得诺贝尔奖”。而周培源老先生却是中国学术界的泰斗，钱学森也曾称他为老师。吴大猷当然也是世界科技界的风云人物、原台湾研究院的院长。正是在这些名师的指点栽培下，使朱光亚的学业有了坚实的基础。抗战胜利以后，朱光亚毕业留校任助教。

1946年，吴大猷教授得一笔经费赴美研究、讲学，可带两名研究生随行。吴大猷挑选了朱光亚和李政道。1946年9月，朱光亚进入美国密执安大学研究生院学习。在密执安大学学习的第二年，朱光亚在校物理学家M. L. Wiedenbeck副教授的指导下从事核物理实验研究，发表了《符合测量方法(I)β能谱》、《符合测量方法(II)内变换》等论文。在核物理这门当时迅速发展的尖端学科里，留下了自己的足迹。1949年秋，他通过了博士答辩。关于朱光亚的归国，他绝对是好样的。正是由于他喝长江水长大，他那颗中国心无时不在怦怦地跳动。就在1950年3月18日，朱光亚等52名留学生在纽约《留美学生通讯》第三卷第8期上发表的《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信》中就这样说：“从现在起，四万万五千万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企业家将在反封建、反官僚资本、反帝国主义的伟大旗帜下，团结一心，

合力建设一个新兴的中国，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一个以工人农民也就是人民大众的幸福为前提的新中国……我们是在朝着充满光明前途的大道上迈进，这个建设新中国的责任是要我们分担的。同学们，祖国在召唤我们了，我们还犹豫什么？彷徨什么？我们该回去了。”“回去吧，让我们回去吧，把我们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朱光亚这一批莘莘学子讲得多好啊！十多年后，他们的诺言实现了。当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海外的一位华人记者曾这样写道：“中国人的惊喜和自豪是无法形容的。在海外中国人的眼中，那菌状爆炸是怒放的中华民族精神的花朵。那从报纸、广播中传出的新闻，是用彩笔写在万里云天上的万金家书。”

3. 中国的“洛斯阿拉莫斯”

1950年春，朱光亚从美国回到了北京。他先在北京大学任物理系副教授。两年后，调东北大学（现吉林大学）新建的物理系任教授。这期间，朱光亚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不知是他所处的地理位置还是考虑他高水平的英语会话能力，他被选调到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停战代表团当了一名译员，参加了举世闻名的板门店谈判。谈判异常艰苦，人们的神经处于极度的紧张之中。那时大家常想，一旦达成协议，大功告成，最大的愿望就是美美地睡一觉。朱光亚就这样工作着，他同时也锻炼了自己的外交才能。时至今日，他总也忘不了《三千里江山云和月》的歌：“情切切，意切切，难忘那三千里江山云和月；风潇潇，雨潇潇，难忘那一把炒面一把

雪……”更有意思的是，参加过上甘岭战役的15军参谋长张蕴钰，后来成了中国的第一任核司令，而朱光亚也成了研制核武器的元老，两位老伙计在朝鲜碰没碰面？不知道，但以后却共事在一起，并成了国防科委的领导。

毛泽东发出我们也要搞原子弹以后，朱光亚被召回北京大学，参与了组建原子能专业，担负起了中国培养第一批原子能专业人才的重任。这批毕业生以后成了中国核事业的中坚力量。

1957年，朱光亚经过钱三强的推荐，被调到原子能研究所任室副主任。他参与了由原苏联援建的研究反应堆的建设和启动工作，并从事了中子物理反应堆物理研究，发表了《研究性重水反应堆的物理参数的测定》等研究论文。随后，他领导设计、建成了轻水零功率装置并开展堆物理实验，跨出了中国自行设计、建造核反应堆的第一步。1959年夏，中国政府决定成立自己的核武器研究院。也许是参考了美国的做法，当年美国的原子弹专家奥本海默，他认为搞原子弹试验最重要的就是要防止泄密，在选择场地时，人迹罕至乃是最重要的。所以他最后把原子弹试验场所定在了杳无人烟的洛斯阿拉莫斯。这个地方是美国最偏僻的地带，与世隔绝，它位于险峻的克利斯朵山脉。中国核武器研究院的造址几经挑选，最后选中了青海湖北岸西约103公里的一个叫金银滩的地方。再经专家多次勘察，划定了1170平方公里的面积作为研究原子弹的禁区。当一切都步入正轨后，这千余公里的土地就成了军事重地。外表看，它是一个小镇，但实际上它却是一个人造卫星也难以侦测出的原子

城。多年后，一个外国记者以《青海高原上的原子城》为题，这样描述了它：“这座原子城究竟生产了几枚原子弹？这是中国的最高机密，不过，从一块纪念碑碑文上写着试爆了16次，可知原子弹的数量起码也在16枚以上。到了1992年9月1日，原子城揭去了它的神秘面纱，在大草原上竖立了纪念碑，1994年对外开放。记住它，它是中国的‘洛斯阿拉莫斯’！”

这个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是李觉将军，也是个传奇人物，关于他的报道很多，这里不再赘述。从建院伊始到步入正轨，其中艰苦可想而知。他开初挑选了三名助手，其中一名就是朱光亚。朱光亚当时年仅36岁，就挑起了中国核武器研制的科学技术领导人的职务。这期间，他配合李觉做了大量的工作，主要负责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全面责任，亲自参加领导与指导了研制任务分解、确定应该研究的主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技术，选择解决问题的技术途径，设立课题并制定重要攻关课题的实施方案等。

在原子弹研制的关键时刻（也可以称为攻关阶段），朱光亚发挥了他的灵魂作用。他出任了四个技术委员会之一的中子点火委员会的负责人，协同冷试验委员会研究确定点火中子综合可靠性的检验方法等关键课题的攻关。这期间，他主持起草的《原子弹装置科研、设计、制造与试验计划纲要及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和《原子弹装置国家试验项目与准备工作的初步建议与原子弹装置塔上爆炸试验大纲》。前一个文件对很快完成第一颗原子弹装置的研制起了重要作用，被称为原子弹研制工作的里程碑。后一文

● 英雄人物 ●

件对于提前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及试验中难题的解决起到了关键作用。朱光亚这一功绩将永载史册。

一位外国记者这样评价那时朱光亚的工作,他说:“作为设计院一位科研工作的带头人,朱光亚很注意理论与应用性研究的结合,也很注意技术质量管理方面的培训。他那高标准的科学要求和在研究院培养起来的严谨工作作风,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并常常受到同行的称道。在一次为表彰对核计划作出特殊贡献人员的重大活动场合,由于朱光亚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周恩来总理特意赞许了他。”

1962年秋,张爱萍和刘杰(时任二机部部长)等10人受聂荣臻元帅指派,到原子弹研制第一线深入实地考察。他们来到了青藏高原的研究院。张爱萍见到了朱光亚时,朱光亚说:“欢迎首长来检查指导。”张爱萍又开起了玩笑:“你们都是些大科学家,我一个‘土八路’,是来拜师学习的,请多加指导。”

刘杰回忆这次调查时说:“青海那个地方太艰苦了,有些地方比当年红军走过的路好不了多少。可是像朱光亚等一大批科学家都是吃过洋面包的,就在那里工作。”

值得一说的是,就在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朱光亚还做了一件特殊的工作。那是1963年7月,美英苏三国代表在莫斯科准备签订《关于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试验条约》。这个条约意在他们可以进行地下核试验,别的国家就不能搞大气层等试验了。很显然,他们想扼制中国的核试验。在条约即将签订前,周恩来派刘杰部长找科

技术人员讨论并征求意见,为我国政府准备一份严正声明资料提纲。刘杰指定朱光亚负责这项工作,并且要求一定要在7月23日条约签订前拿出来。只有几天的时间,火烧眉毛啊!朱光亚组织人员查阅资料,最后由他连夜起草上报资料提纲。出来后又几经修改,终于及时为《人民日报》准备好所需的一切文字资料。上报的这些文字内容也是朱光亚一批科学家搞核试验的决心:你们企图捆住我们的手脚,办不到!地下核试验技术上更复杂,吓不倒我们,我们也要搞!……

4. 于无声处听惊雷

朱光亚说得好:“核武器研制是一项综合性很强的大科学工程,需要有多种专业、高水平的科学技术人员通力协作。”他在回顾这项事业时特地提到了钱三强、邓稼先、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程开甲、陈能宽、周光召、龙永光、何泽慧等等科学家不可磨灭的功勋。正是这些人从事核武器研制后,便隐姓埋名,仿佛一夜之间便失踪了,他们的爱国精神比一千个太阳还要亮。当然,朱光亚也是其中一分子。

时间到了1964年的上半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各项准备工作就绪。爆炸的试验场地在被称为“死亡之海”的罗布泊进行。核试验基地的首任司令张蕴钰早在1958年就与朱光亚一样投入这项工作。只不过他们分工不同,朱光亚负责科研,而张蕴钰负责场区的勘察和建设。这个地方原来连名字也没有,后来被张爱萍将军取名叫马兰。

张爱萍是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现场总指挥。而朱光亚等科学

家便是现场的技术负责人。请看,历史留下了这样一些镜头:

1964年10月15日,原子弹转交仪式在基地举行。朱光亚等科学家和领导参加了转交仪式。八一电影制片厂拍下了这些珍贵的镜头。120米高的铁塔顶端的技术人员接过了原子弹,并把它装入了铁塔。在以后的几个小时里,朱光亚他们和基地的工作人员夜以继日地工作……

1964年10月16日14时59分59秒,一朵黄褐色的蘑菇云在中国的罗布泊冉冉升起,这是东方惊雷的世响和轰鸣,这标志着中国有了自己的原子弹。这一成功,震惊了世界。目睹这一壮观景象,李觉和吴际霖等领导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而朱光亚、王淦昌、彭桓武、郭永怀、陈能宽等,在多年的劳累之后,因一下子放松而激动不已,他们都哭了。战地指挥员张爱萍、刘西尧和张蕴钰等都激动得“发抖”……

塔爆半年后中国就爆炸了第一枚空投航弹。

两年后就试射了第一枚载有核弹头的导弹。

毛泽东曾这样说:“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

其实,早在原子弹爆炸之前,在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的安排下,氢弹的探索就已经在原子能研究所开始。1965年初,这个研究小组调到核武器研究所同这里的研究人员一起攻关。在朱光亚、彭桓武的指导下,由邓稼先、周光召组织理论研究人员和有关专家,经过总结分析,制定了探索氢弹的理论研究计划。原子弹爆炸成功后,由于有毛主席的指示,氢弹研制的步伐加快了。

1965年底,朱光亚等一批科学家在马兰基地召开了1966—

1967 两年科学研究生产规划的讨论会上,介绍了新提出的氢弹原理和实现它所必须解决的关键技术问题;定下了关于热核材料的核试验仍按原计划进行,并提出力争 1966 年内先用塔爆方式进行小当量的氢弹原理实验。

这次会议的情况及时上报了中央,周恩来、聂荣臻很快批准了这一安排。就在这时,十年动乱开始了。研制氢弹的科学家们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冲击……

为了保证氢弹研制按原计划进行,周恩来、聂荣臻等领导煞费苦心,不但做两派工作,还以军委的名义发出了“特别公函”,并报毛泽东批准对各国国防工业部门实行军管。

1966 年底的氢弹原理塔爆试验和 1967 年 6 月的百万吨级氢弹空爆试验各项准备工作如期完成。这期间,朱光亚随聂荣臻两赴马兰基地,和其他科学家及工程技术人员一起努力,在最困难的条件下,使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后来,有一位权威人士曾这样说:“无论是原子弹还是氢弹的研制,从组织队伍到创造条件,从选定攻关方案到实验,环环相扣,没有一环不浸透朱光亚的心血。”这话是中肯的。

关于中国的地下核试验,朱光亚也是功不可没。他在六十年代中期就提出:将核试验转入地下,无论从减少放射性污染角度,还是从更深入地研究核武器爆炸过程的规律角度,都是很必要的。在他的大力支持下,1969 年 9 月 23 日,中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地下核试验。他还非常重视贯彻“一次试验,多方收效”的方针,主张一次试验中尽可能多安排一些诊断项目,多解决几个科学技术问题。他的一些主张和做法,对

加快中国核武器的发展和核能的利用,都起到了轴心人物的作用。

1970 年,朱光亚从原核工业部第九研究院调任国防科委副主任。以后,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办合并为国防科工委,现又改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他先后出任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主任及总装备部的科技委主任。于是在他身上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时而老百姓,时而军人,直到今天,他军内军外的职务仍然一肩挑。其实这种现象不仅仅是朱光亚一人。所有的航天和铸造核盾牌的元老们几乎都有当兵的历史。他们太可爱了,叫穿军装就穿,不穿就脱,但他们那颗热爱事业的心没有变。这个事业本身就不分你我,谁也离不开谁。谁还讲究谁穿军装不穿军装啊!朱光亚站在一个更高的起跑线上后,他就像一把双刃剑,压在他肩上的担子太沉重了。一方面他要继续负责核武器的研制装备和核能的和平利用;同时他又是国务院高技术协调指导小组成员。他的目光始终在捕捉世界瞬息万变的发展。他指出:“高技术的跟踪和发展研究工作,在密切注意追踪国际先进水平、新技术成果和最新的发展方向的同时,必须有创新精神,必须重视高技术发展战略的深化和动态研究,不断调整研究方向和任务。”这些年,他参与与组织了我国第一座核电站——秦山 30 万千瓦核电站的筹建和多项目的研究开发。他负责了中国“863 计划”中两个领域的指导工作。参与了有关军控问题的研究与对外学术交流;并撰写了《浅谈军备控制中的物理学问题》等著作。朱光亚永远在科学技术的前沿上冲锋。他以“拉纤”的精神

为祖国的强盛洒下他忠诚的血汗。

“雅号”与其他

朱光亚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后,有人称他为“中国最大智力库”主席。他莞尔一笑,说:“过奖了,我没那么伟大。要说做了一些工作,那是大家做的。我个人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地方。”

置身于政协的工作,他还是那种“大音希稀,大象无形”的为人处事态度,丝毫没有大科学家和国家领导人的架子。他在政协来来往往接待和会见许多中外名流和科技界人士,他留给人的印象是诚恳待人和学者的风范。他曾参与接待从台湾回大陆访问的吴大猷先生,他还是喊他老师,并感谢他对自己的栽培。在政协,他作为科学家的代表之一,呼吁社会主义的法制建设进一步尊重科学,为宣传科学、普及科学知识,揭露假冒伪劣商品和虚假广告提供法律保障等等。除了他所担任的许多重要职务外,他还是第三届至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先后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杰出青年基金评选委员会主任。

朱光亚的外表给人很“冷”的感觉,似乎他在科技上雄韬大略和气势如虹外,就没什么特点了。其实不然,他和钱学森一样,是一个有着丰富内心世界的科学家。他也喜欢欧洲古典音乐。在他家里的书橱中存放了大量的世界名曲唱片和盒带等,中外文学名著也赫赫在目。他喜欢体育运动,年轻时打过乒乓球,还参加过篮球比赛。他还喜欢爬山,说:“当年大西南的三线建设选址,我爬过

四川客家探訪录

□文 / 张全庆

听说四川省有客家人二百万，其先祖均是在二、三百年前，从闽西、粤东北、赣南等客家祖地迁至四川的，当时正是明末清初，此三地客家人亦多迁往台湾、日本、新加坡等东南亚及世界各地。应该说，如果闽西、粤东北、赣南三地孕育形成客家民系的话。那么在二、三百年前，东南亚及世界各地客家、四川陕西等各内陆省的客家祖先应共同生活在

四川许多荒山野岭，但峨嵋山一次也没去过，忙啊！如今又出了一个九寨沟，更神往，不知哪天才能了却心愿。”

朱光亚身居要职，军内外的头衔都属于重点保护一级的人物了。然而他的家不是独门独院，就在军队大院一个很不起眼的地方，那房子是一个二层小楼，还是五六十年代的作品，居住的面积也就是一个军级干部享受的待遇。几十年了都不搬家，他喜欢那个地方。笔者与他的儿子朱明远

一个故乡：闽西——粤东北——赣南这闽粤赣三省交界区。

假想在二、三百年前，中原汉民在闽、粤、赣三省交界区形成客家民系已有相当的年代了，已形成相对稳定的民系。由于当时人口的大量繁衍，加上当地山多地瘠，或其他别的原因，在明末清初，许多客家同族兄弟姐妹分路外出创业，一支远

赴南洋及世界各地；一支西进祖国大陆内地湖南、四川、陕西等地，垦荒建园，安家立业。应该说，闽、粤、赣客家与祖国大陆内地、海外客家有着历史形成的、不可分割的土族血缘亲情关系。

前段时间，我到四川省探访客家居住地，历时二十余天，拜会当地客家人士，翻阅遗留下来的姓氏族谱，了解当地的客家迁移历史、分布及当地客家的语言、风

是战友，曾去过他家几次，也曾与朱光亚聊过天，老人家丝毫没有那种不可一势的腔调，他亲自为你沏茶，叫你吃东西，甚至与你拉一些家长里短，让你感到春天般的温暖。有一次，他在东北大学任教时的一位学生如今已是一介平民要见朱光亚，请笔者帮助联系。朱光亚热情接待了她，他们见面后好不快乐，谈东北的冰天雪地，谈唱歌跳舞，谈抗美援朝……要知道这时的朱光亚已是中央委员和军队的大首长啊！朱光亚就

俗、民居建筑等。承当地客家人士的热情支持与帮助，提供族谱及有关资料，使我此行收益颇丰。现稍作整理，以示同人。

四川地处中国西南腹地，长江上游。秦统一全国后，在四川设置蜀郡、巴郡，故四川称为巴蜀，四川又因气候湿润、温和，物产丰富，而被世人称为天府之国。明末清初，四川由于长年战乱，土著已经极少，现在的四川人，多为清初外省移民的后代。19世纪初，成都流传这样一种说法：“大姨家陕二姨苏，大嫂江西二嫂湖。戚友初逢问原籍，现无十世老成都（引自六对山人《锦城竹枝词》）。”可见一斑。而在这天府之国的腹地地带，生息着一支保留着浓郁的岭南风俗习惯，至今还讲一口较为标准的客家方言的客家民系。

我到成都东郊龙泉驿区的洛带镇，用梅县客家话与当地老人、小孩交流毫无障碍。我说明我家在广东梅县，当地客家人紧紧握着我的手或揽着我的肩膀：“你是涯登个老家人啊（你是我们老家的人啊）！”令我备感亲切。

一、客家入川的背景

是这样的平民心。

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决定：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在23名授奖人员的名单中，就有朱光亚的名字。那天，大家从电视上都看到了，江泽民主席把奖章挂在了朱光亚的身上。授奖仪式完后，朱光亚等受中央的委托，又把钱学森的奖章送到了钱学森家里。两位老战友的手握在一起开心地笑了……